



传播与非传统安全丛书

文化安全

——基于社会核心价值观嬗变与传播的视角

喻发胜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子课题

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传播与非传统安全丛书

文化安全

——基于社会核心价值观嬗变与传播的视角

喻发胜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安全——基于社会核心价值观嬗变与传播的视角/喻发胜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5

ISBN 978-7-5622-4269-7

I. 文… II. 喻… III. 文化—国家安全—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0408 号

文化安全

——基于社会核心价值观嬗变与传播的视角

© 喻发胜 著

责任编辑:谢 琴

责任校对:王 炜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武汉湖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7.75

字数:200 千字

版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19.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文化安全及其“深刻影响者”	(12)
第一节 关于文化的幻想与焦虑	(12)
一、从文化中心主义到普世文明幻想	(13)
二、文化焦虑	(20)
第二节 实践论与符号学视域下的“文化”	(25)
一、作为术语的“文化”	(26)
二、实践论视域下的“文化”	(32)
三、符号学视域下的“文化”	(36)
第三节 文化安全的“深刻影响者”	(43)
一、“为我关系”:从价值到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44)
二、社会核心价值观与文化安全	(48)
三、“大麦克”与“好莱坞”的威胁	(58)
第二章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嬗变	(62)
第一节 嬗变动力:利益驱动	(63)
一、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利益动机论”	(63)
二、利益: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立统一	(65)
三、利益:多样性与交互性的对立统一	(67)
第二节 利益博弈的“参与者”	(70)
一、生产力的提高	(72)

二、生产关系的调整	(75)
三、地理环境的差异	(77)
四、历史文化的传承	(83)
五、异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85)
六、社会意识的能动	(89)
第三节 嬗变焦点:利益与理性	(93)
一、作为“利益实现的社会共识”的理性	(93)
二、理性对于利益冲动的制衡	(95)
第四节 嬗变结果:符号共识与价值共识	(99)
一、符号共识:葛兰西“霸权理论”的贡献	(100)
二、价值共识:均势博弈中的利益共享	(105)
第三章 网络时代的舆论与社会核心价值观	(109)
第一节 “关口”拆除:“事所必至,天意使然”	(110)
一、人类传播的“术一道”之变	(110)
二、“把关人”与媒介控制	(115)
三、“关口”拆除与“把关权”分散	(125)
第二节 作为利益博弈方式的网络舆论	(128)
一、从“舆人之论”到网络舆论	(129)
二、从“新意见阶层”到“自由人的联合体”	(141)
第三节 网络时代的舆论自由与身份平等	(146)
一、从意志自由到网络舆论自由	(147)
二、从自然平等到网民身份平等	(155)
第四章 双重博弈背景下的国家文化安全	(165)
第一节 全球化与社会转型中的双重博弈	(166)
一、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遏制战略	(167)
二、社会转型中的群体性事件	(175)

第二节 符号共识、价值共享及其偏离	(181)
一、当代中国公众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现状	(181)
二、利益共享中的“符号—价值”偏离	(196)
第三节 非合作博弈的社会风险与利益博弈机制的调整	(199)
一、非合作博弈及其社会风险	(199)
二、利益博弈机制的调整	(205)
结 语	(218)
参考文献	(225)
后 记	(241)

导 论

1993年,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的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长期从事政治学研究且身兼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亨廷顿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①

在亨廷顿的视域里,文明是人类的终极部落,“文明的冲突”就是全球规模的部落冲突。亨廷顿将“文明的冲突”归纳为两种形式:断层线冲突与核心国家冲突。所谓断层线冲突,主要是指“在地域或微观层次上,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国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之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的冲突”^②。所谓核心国家冲突,主要是指“在全球或宏观层次上……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冲突)”^③。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1.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29.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29.

亨廷顿认为,断层线冲突通常发生在信仰不同宗教、不同神的人民之间。历史上的冲突遗产,彼此仇恨的历史记忆,人口比例巨变带来的政治、经济压力,新兴政治实体对民主化进程的强烈要求等,往往是断层线冲突爆发的原因。

“文明的冲突”是否会引发“文明的战争”?亨廷顿认为:“涉及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家的全球战争很可能不会发生,但不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战争可能由不同文明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升级而引发。”^①“引发全球文明间战争的一个更为危险的因素,就是各文明之间以及核心国家之间均势的变化。”^②亨廷顿预言:“……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③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进行挑战就有可能发生一场大战。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对这场可能发生在中、美这两个不同文明大国之间并可能引发众多文明国家参与的大战进行了详细“预测”,并预言这场文明间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免于参战的文明,全球权力(中心)将从北向南转移。

由于“文明冲突论”几乎刺激了当今世界所有文明的神经,故甫一问世即引起国际舆论界、学术界的强烈反响。美国《外交》杂志的编辑们指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继20世纪40年代坎南提出“遏制”思想之后又一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④。美国前国务卿基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361.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361.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361.

④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419.

辛格指出：“亨廷顿是西方最优秀的政治学家之一，他为理解下个世纪全球政治的现实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冷战结束以来出版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①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一本理性的杰作，思想开阔、想象丰富、发人深省，它将使我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②。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出版后，就在人们的“新奇、义愤、恐惧和困惑”中，世界政治的热点恰恰发生在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上”：波斯尼亚、车臣、外高加索、中亚、克什米尔、中东、斯里兰卡、苏丹以及其他许多地区^③。批评者指出亨廷顿可能提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文明的冲突由于亨廷顿预测其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其发生的可能性。亨廷顿对此的解释是：“任何预测都不是自我实现的或非自我实现的。预测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④

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使利益博弈由“血缘认同”、“契约认同”进入到“文明认同”的时代。亨廷顿说，“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人们不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⑤。正是在这样的话语中，文化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 等,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419.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 等,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419.

③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 等,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419.

④ [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 等,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3.

⑤ [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 等,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6.

不仅“可以指莎士比亚或超人漫画,可以指歌剧或足球,也可以指在家里刷盘洗碗的人或美国总统办公室的组织结构”^①,文化还与利益、权力、政治密切相关,“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②,当代地缘政治权力正越来越明显地发生“文化转向”。

二

文化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同一些更古老的学科如地理学、社会学和英国文学一起也在发生转向——建立在“对政治的新理解”与“对权力的新定义”之上的“政治转向”。

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国际知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认为,很多关于文化、权力和不平等的当代理论论述都来自马克思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中,阶级不平等的内在经济结构、阶级间的对立与斗争关系、权力与文化之间的联系等是其强调的重点。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取决于一个人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还是自己劳动力的拥有者。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结构围绕着两个主要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日益简化。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他们之间有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分配。”^③

①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M].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4.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6.

③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M].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9-100.

资产阶级相对于无产阶级这种不平等的权力为什么有可能长时间保持？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是因为“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经济权力，同时还实施政治权力，以此形构并控制着国家机构”^①，从而使他们垄断了对暴力的使用。另一方面则是资产阶级实施的文化控制。马克思认为文化作为意识形态，作为资产阶级片面、褊狭的支撑物，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特权利益而设计的，其目的是钝化无产阶级对于自身利益的理解与追求，从而掩盖他们的真正利益。因此，马克思提出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②的著名论断。

“马克思看到，所有国家机构都在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文化价值中运行。资产阶级拥有权力，通过权力获得知识，通过权力和知识创造了支配性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着眼点在于权力、知识和文化之间的联系，并构想出一种系统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的信仰和实践是权力关系的一种文化符码。”^③应该说，马克思关于文化、权力与利益的论述不仅适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而且适用于对阶级社会产生以来所有社会的分析。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则将权力界定为：“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行动中甚至是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④从非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等级与不平等，韦伯认为社会中权力的运作比社会的经济基础更具根本性，“阶级、身份和党派”这三个基本范畴成为韦伯分析不平等的基本范畴。

①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M].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02.

② [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53.

③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M].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02.

④ 转引自廖扬丽.论法理型政府权威的一般理论[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9).

在韦伯看来,“不平等可能被定位在以经济划分的阶级那里(与马克思强调所有权不同,这里韦伯强调市场购买力),也可能建立在身份集团(围绕特权和荣誉观念组建起来的)以及政党和政治派别基础上”^①。

米歇尔·福柯和其他后结构主义者则对权力作了更为宽泛、深刻的引申,他们通过权力和权力关系来思考世界。米歇尔·福柯说:“权力无所不在;不是因为它包含一切事物,而是因为它来自所有地方。”^②史蒂文·卢克斯的“三种权力观”则对什么是权力作了更为精辟的阐释。他说,“单一向度的权力观”是指A能够让B去做某件他本不愿做的事;“双向度的权力观”是指群体A不仅可以决定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结果,而且可以决定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三向度的权力观”是指有权者拥有权力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他们能够:

通过这样的方式塑造人们的观念、认识和喜好;使人们接受他们在既有秩序中的地位,这或是因为他们认为或想象这是别无选择的,或认为这是自然的和不可改变的,或是因为他们视之为天意注定的和有益的。权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防止人们产生任何不满的。^③

第一种权力可能通过暴力或金钱得以实现,第二种权力可以通过政治谋略、法律、法规、制度设计来完成,第三种权力只能通过文化这一途径才能实现。以至于后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格伦·乔丹和克里斯·威登作出这样的判断:

……我们将做出一个会令人反感的断言:社会和文化生活中

①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M].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04.

② [法]米歇尔·福柯.性史[M].姬旭升,译.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81.

③ 转引自贺玉高.文学理论教材的权利与权力——从文学理论教材看文艺学的学科建设[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的每种事物在根本上都与权力有关。权力处于文化政治学的中心。权力是文化的核心。所有的指意实践——也就是说,所有有意义的实践——都涉及权力关系。(乔丹和威登,1994:11)^①

对于权力的重新定义,使得权力成为文化研究中重要的术语与研究对象,并且可以用来解读全部的文化实践和产品。如果我们把“政治”看做权力关系的领域,那么“政治”的含义也就因为权力的重新定义扩展到了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关系,而不仅仅是阶级关系。

马克斯·韦伯、米歇尔·福柯、史蒂文·卢克斯、格伦·乔丹和克里斯·威登等人的研究改变了“政治”的概念。在他们的视域里“任何东西都是政治的”,任何东西都是一个被争夺的权力关系。显然,这些观点丰富、拓展了马克思关于权力、政治与文化的理论。这种对于政治与权力的重新理解与定义,不仅涉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还涉及从“工业化社会”到“信息化社会”、从“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等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变。这些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导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生活、常规政治及更广泛的权力关系的转型。但这种差异性并不能掩盖彼此的共通之处,即通过对权力冲突与利益博弈的剖析,我们发现文化不仅与利益、权力、政治密切相关,而且文化就是利益、权力、政治本身。这也是当代地缘政治权力发生“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发生“政治转向”的根本原因。这两种转向使常规的政治学与非常规的政治学以一种崭新的方式结合到了一起,这使我们对全球化进程中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进行理解成为可能。

三

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

^①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M].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29.

度,1519年—1522年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他们开启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东西两半球一体化的新纪元,更是揭开了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序幕。至此,人类从以往各个领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状态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不同民族的文化因而彼此交流,也相互冲突。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就敏锐地察觉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普遍化与人类的“交往革命”,人类社会的历史正在由民族的、国家的向世界历史转变。

在500年的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交流与冲突的总趋势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殖民过程。这种殖民过程大体分为武力殖民、经济殖民与文化殖民三个阶段。

武力殖民主要是通过坚船利炮直接占领他国的土地,掠夺其资源、劳动力等;或者通过枪炮保护非法贸易,攫取超额利润。“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帝国’。……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①

经济殖民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并以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支柱确立世界经贸和金融的格局。这一格局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原则下形成的。从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货币、石油、粮食、贸易甚至技术标准等经济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殖民统治。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37.

文化殖民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对非西方国家推行所谓普世价值观进而获取全球“话语霸权”的行为。尤其是一贯自认“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权力有限的政府等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从而形成所谓的“普世文明”概念。

1991年12月25日,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为标志,苏联解体。“这样一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在74年之后划上了句号。(它)没有被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干涉扼杀于襁褓之中,没有在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面前溃败,却在其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外交诸方面并无重大危机时,戏剧般地坍塌了。无论捍卫者或颠覆者,都没有为之流血,更没有战争——甚至已没有捍卫和颠覆者。”^①苏联解体的原因被称为“现代世界真正的斯芬克司之谜”。苏联解体使西方人更加相信其民主、自由主义思想取得了全球性胜利,更加相信这一思想的普遍适用性。然而,冷战结束后世界并没有统一在“普世文明”的神圣光环下。因为所谓“普世价值”只不过是西方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以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策略。正如亨廷顿所言:“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明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②

在全球化进程加剧的背景下,国家、民族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进入到了“文明认同”的时代。“不同文明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总是产生集团之间冲突的东西:对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的控制,也就是相对于另一

① 王康. 十月革命 90 年·救赎、悲剧与启示[N]. 南方周末, 2007-11-7.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 等,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55-56.

个集团对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能力。”^①这种一个利益集团对于另一个利益集团的“相对权力的控制”,即“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能力”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不同文明体系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碰撞与冲突。因此,在全球化进程加剧的背景下,研究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嬗变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今,中国社会在面临全球化进程的同时,还面临着自身的深刻变迁——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的本质是利益格局与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也意味着“利(权)益分配(保障)原则与方式”——社会核心价值观及其背后的利益博弈机制——将发生深刻嬗变。

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②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内核即为社会核心价值观。存在决定意识,思想支配行动。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得到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社会核心价值观及与之契合的利益博弈机制——的强力支撑。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国家就可能分裂,民族就可能解体,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利益都会受到巨大影响。因此,建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与社会的进退治乱^③。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④本书正是在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从利益博弈的视角研究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嬗变对于国家文化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134.

②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5.

③ 参见韩震主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3.

④ [德]马克思.集权问题[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89.

安全的影响,当代地缘政治权力的“文化转向”与文化研究的“政治转向”则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撑。

文化安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于国家的兴衰与人民的福祉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虽然“文化”这一术语具有极为复杂的历史,并在不同领域具有多种含义,但对于面临全球化与社会转型双重挑战的中国,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坦荡博大精神,重新洞悉、明辨文化的本质特征,通过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来捍卫国家民族的利益则成为一项更为急迫的任务。